代购毒品“蹭吸”的认定与处理

□ 方文军

6·26 禁毒日特稿

“蹭吸”在吸毒群体中很常见，通常是指在他人吸毒时免费吸食少量毒品的情形。代购“蹭吸”是“蹭吸”的一种，是指代购者将所购毒品交给托购者后免费吸食少量毒品的情形。代购“蹭吸”多为当场发生，即代购者买到毒品后便与托购者一同吸食，但也可事后发生，即代购者将毒品交给托购者时拿走少许毒品准备日后吸食，或者代购者间隔一段时间后到托购者处“蹭吸”；既可能是“明蹭”，即经托购者同意或邀请后“蹭吸”，也可能是“暗蹭”，即未经托购者同意而私自截留少许毒品供自己日后吸食；既有偶尔“蹭吸”，也有经常“蹭吸”。

对于代购“蹭吸”这种结合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往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蹭吸”的本质特征是不支付财产对价而免费吸食毒品，不论代购者是当场“蹭吸”还是事后“蹭吸”，也不论是偶尔“蹭吸”还是多次“蹭吸”，都属于从中牟利，故代购“蹭吸”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蹭吸”是从属于托购者的吸毒行为，而吸毒本身不构成犯罪，对代购“蹭吸”行为是否认定为贩卖毒品罪要慎重，主要是看能否把“蹭吸”这种生活意义上的牟利行为认定为代购毒品中的“变相加价”，宜适当控制处罚范围，仅对情节严重的代购“蹭吸”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罪。

相关指导文件对代购“蹭吸”行为的处理规则，经历了一个从“原则上不定罪”到“原则上定罪”的转变过程。

2015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5年纪要》，已废止）曾提出，代购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实际上包含了对代购“蹭吸”行为原则上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意图，只是因起草过程中存在争议而未直接对代购“蹭吸”行为的定性作出明确规定。根据《2015年纪要》上述规定的精神，对代购“蹭吸”行为不应大范围作为犯罪处理，而应只将其中危害程度等同于变相贩卖毒品的少数情形（特别是以蹭吸贩情形）认定为犯罪。

随着禁毒工作形势的变化，202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2023年纪要》）对代购“蹭吸”行为的处理方式作出重大调整，采取的原则上定罪处罚的思路。该纪要提出：“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部分毒品款、毒品……属于变相加价。代购者从托购者事先联系的贩毒者处，为托购者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并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的，一般不以贩卖毒品罪论处。”该项指导意见表明：（1）对代购者收取或者私自截留部分毒品的，不论出于吸食还是其他目的，也不论是当场“蹭吸”还是事后“蹭吸”，原则上认定为变相加价牟利，

按照贩卖毒品罪处理，由此大大拓展了对代购“蹭吸”行为的定罪范围。（2）作为例外，在同时符合上述三项条件的前提下，对“跑腿型”代购“蹭吸”行为一般不定罪处罚。整体上看，《2023年纪要》的上述指导意见加大了对末端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充分体现了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政策精神，为代购“蹭吸”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有利于统一司法实务工作中的认定标准。

在理解、适用《2023年纪要》的上述规定时，有如下几个具体问题值得关注、探讨。

一、“蹭吸”与代购毒品之间不对应情形的处理

这种不对应至少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延时现场“蹭吸”。这种“蹭吸”是指代购者将所购毒品交给托购者后，间隔一段时间（如次日或数日后）再与托购者共同吸食毒品的情形。这种“蹭吸”同时具有延时性和现场性的特点，既不同于代购者交付毒品时发生的当场“蹭吸”，也不同于代购者将少许毒品拿走的非现场事后“蹭吸”。通常而言，“蹭吸”作为代购者获得的酬劳，与代购毒品行为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一次代购可获得一次“蹭吸”机会，但是，如果代购者与托购者熟识，“蹭吸”与代购毒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会淡化，代购者未必当场“蹭吸”，也未必拿走少许毒品供自己日后吸食，而是日后随机性地找托购者“蹭吸”毒品。如果代购毒品本身是出于帮

忙，代购者日后现场“蹭吸”与以往的代购毒品行为之间没有明确对应关系的，不宜认定代购者“从中牟利”，进而不能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如果在案证据证明代购者日后的现场“蹭吸”是基于其以往代购毒品而获得的酬劳，则可以考虑定罪处罚。另一种情形是先“蹭吸”后代购毒品。例如，甲与乙是毒友，甲在“蹭吸”乙的毒品时，乙称需要再买一点毒品，甲称有购毒渠道，可前往代购。对这种行为“蹭吸”在先，临时起意代购毒品，一般不宜认定为代购者“从中牟利”，进而不能认定为贩卖毒品罪。但是，如果托购者先提出代购请求，代购者答应在“蹭吸”之后再去购买毒品，“蹭吸”具有明显酬劳性质的，则可认定代购毒品与“蹭吸”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进而认定代购者构成贩卖毒品罪。

二、代购者收取、截留部分毒品情形的毒品数量认定

对此，《2023年纪要》没有作出规定，工作中宜区分不同情形进行认定。（1）如果代购者收取或者截留少量毒品是为了贩卖而不是自吸，则应当按照其代购的全部毒品数量认定为贩卖的毒品数量。例如，代购6克海洛因，截留0.5克用于贩卖，应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为6克海洛因。（2）如果相关证据证实代购者收取或者截留的少量毒品已被吸食或将被用于吸食，则不能将该部分毒品计入贩卖的数量。例如，代购9克冰毒，收取的0.5克用于吸食，可认定其贩卖的毒品数量为8.5克冰毒。同理，代购者因多次当场“蹭吸”而被认定为贩卖毒品

罪的，不应把代购者吸食的部分计入其贩卖的毒品数量。（3）如果代购者对收取或截留的少量毒品辩称将用于自吸，但相关证据表明其亦有贩毒行为的，则可查获的该少量毒品计入贩卖毒品的数量。

三、不以贩卖毒品罪处理的代购“蹭吸”情形

如前所述，《2023年纪要》对代购“蹭吸”情形不以贩卖毒品罪处理规定了3项条件：（1）托购者事先联系贩毒者；（2）代购的毒品仅用于吸食；（3）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是用于自吸。显然，这三项条件较为严格，当代购“蹭吸”行为同时符合这三项条件时，实际上说明代购者只是充当“跑腿”的代购者，其从属性、被支配性十分明显，对这种情形“一般不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的理由较为充分。理解该三项条件时，还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

1. 托购者“指定”上家的情形如何处理？托购者“事先联系”贩毒者不同于代购者自寻毒品上家，代购者自寻上家对本次毒品交易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故不再是托购者的“跑腿”，即便托购者认识该上家，也不符合定罪条件。但是，如果代购者是从托购者“指定”（但未事先联系）的上家购买毒品，尽管从文义看“指定”不同于“事先联系”，但托购者“指定”上家必有缘故（多为熟悉），也往往能体现托购者的意愿和支配力，故仍应认为符合该项定罪条件。如果纠结于“指定”与“事先联系”之间的文义区别，而将托购者指定上家的代购“蹭吸”情形作为

犯罪处理，会造成类似案件处理上的不平衡。

2. “仅用于吸食的毒品”通常是少量毒品，但也可能达到数量较大以上。如果代购的毒品达到数量较大以上，判断这些毒品是否“仅用于吸食”，要综合考虑托购者的单次吸食量、吸食频率、经济条件、是否有贩毒经历等相关情况。此时，代购者虽不因“蹭吸”而构成贩卖毒品罪，但至少与托购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如果是从异地（长距离）购买数量较大以上的毒品，二人还可能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共犯。

3. 代购者“私自截留”少量毒品是否构成盗窃罪？“私自截留”通常意味着托购者不知情，故有观点认为对这种行为即因符合上述三项条件而不认定为变相的贩卖毒品罪，也可认定构成盗窃罪。应当说，私自截留毒品在形式上符合盗窃罪的行为特征，尽管毒品属于违禁品，但认定是否构成盗窃罪仍要考虑毒品的数量和价值大小，不能一概而论。《2023年纪要》提出，盗窃毒品构成盗窃罪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量刑，这就表明并非任何盗窃毒品的行为都构成盗窃罪。如果代购者私自截留的毒品数量颇为可观，达到了盗窃罪的人罪条件，则通常也可认定其从代购中牟利、变相加价，属于与贩卖毒品罪的竞合，此时按照贩卖毒品罪处理更能体现从严惩处的政策要求。但是，对代购“蹭吸”类案件而言，涉案毒品数量通常很小，代购者私自截留的数量就更少，价值很低（如几十元甚至更低），此时认定为盗窃罪的可能性很小。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情况（如代购者多次私自截留少许毒品）可以按照盗窃罪处理。（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提供重要线索型”立功的类型化分析

◇ 王登辉

事实，但如果难以查证属实，通常将其作为线索“乙是毒贩，甲可以在乙下次贩卖毒品时协助警方抓捕乙”。若甲向乙购买毒品并协助警方抓获乙，则属于检举揭发犯罪型立功，而不是提供重要线索型立功。若甲向乙购买毒品，警方不同意甲到交易现场，而是独立抓获乙，则可能认定甲成立检举揭发犯罪型立功，而不是提供重要线索型立功。（3）若是难以查实的犯罪且本身不是证明对象，也无法重新取证的，即使是完整的犯罪事实，亦是无效的犯罪线索。如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十天前乙醉酒驾驶机动车回家，未被警方发现，但我知道”，就是无效的犯罪线索，不可能成立立功。

犯罪分子提供的犯罪线索通常应当是具体的、可证伪的。若是模糊的，即使查实也很难说存在因果关系，不宜认定立功；但并不绝对，若能排除编造或猜测的（如广撒网式乱咬人、碰运气），仍可能认定立功。【例1】2010年，黄某某涉嫌拐卖妇女罪到案后，交代“1999年的一天晚上，在云南省罗平县，我看到三个人杀死一个妇女，将尸体抛到山洞”。民警经过艰辛的走访调查，找到无名山洞，找到骨骸，发现死者是李某某，遂立案。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梁某富、刘某平、王某梅。尽管黄某某提供的线索非常模糊，但不是漫无边际的乱指，其交代对发现和侦破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应当认定黄某某成立立功。

【例2】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绵阳市安州区某水镇某村某组村民李某失踪了14年，我认为他很可能被家人杀死并藏尸”。经查，李某被自家五人共同杀死并藏尸在地窖中。尽管甲不确定犯罪事实发生，也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但犯罪嫌疑人的范围相当小，其交代对发现和侦破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

【例3】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我去某户家里偷窃，发现了大量现金，从家中物品判断这是官员的家，我怀疑这家主人（乙）涉嫌贪污受贿或受贿罪（来源不合法）”。若据此侦破乙的贪污罪或受贿罪，应当认定为甲成立立功；若查明乙是毒贩、大量现金是毒赃，仍不可否认甲提供了重要线索，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若甲到案

后检举“乙是贪官”，未提供细节，即使查实乙犯贪污罪或受贿罪，也不应认定甲成立立功。

【例4】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某法院多年前审结的于某杀妻案是错的，真凶是武某，当时我在对面偷窃，意外看到了”。经查，真凶是武某。尽管“于某杀妻案”早已审结，但甲实际上揭发了“武某犯故意杀人罪”，应当认定甲成立检举揭发犯罪型立功。若甲交代“某法院多年前审结的于某杀妻案是错的，当时我在对面偷窃，看到真凶是一个穿着某类制服的男子，不认识他，反正不是于某”，经查，真凶不是于某，应当认定甲成立提供重要线索型立功。

二、如何理解“重要”

由相关司法解释可知，“重要线索”之“重要”等同于“对侦破其他案件或者抓捕犯罪嫌疑人有实际作用”，其作用可大可小，均不可或缺。“其他案件”应当理解为“自己未参与且自己不是被害人的犯罪”。因为犯罪分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成立立功。

“对侦破其他案件有实际作用”，宜理解为“提供了侦查机关未掌握的事实、信息，且对查明犯罪事实、查明犯罪人身份、抓获犯罪嫌疑人有积极影响”，一般体现为揭露了真凶的身份或罕见的体貌特征、缩小了排查范围、指出漏犯、辨认出死者的身份、指明赃物的去向或藏匿地等帮助行为。提供线索的时间不是必须在相关犯罪立案以后，可以在立案以前；或曰，提供线索促使某个犯罪事实被发现、被立案，即使无力促成侦破，仍未超过“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文义射程，可以涵摄在内。“对抓捕犯罪嫌疑人有实际作用”，一般体现为辨认出真凶、提供了真凶的身份信息（含化名、绰号等）、透露了真凶的藏匿地、联系方式或特殊习惯等帮助行为。其实，严格区分二者没有必要。

【例5】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某县某无名尸案长期没有侦破，我只知道凶手十年前在某农贸市场卖鱼，若看到照片能辨认出来，不知道姓名和其他信息”。这一信息极大地缩小了排查范围，由此查明真凶身份的，即使真凶未到案——就不能说侦破，仍系重要线索，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

【例6】1997年11月，董某娥在永嘉县被万某广杀害，同月女尸被发现，立案

后21年仍未查明其身份。2018年7月，监狱服刑人员甲交代“1997年，江西德兴籍女子董某春在永嘉县瓯北镇被杀，但我不知道凶手的名字”。2018年9月，德兴警方全面排查失踪人口，发现“董某娥”与“董某春”十分相似。经DNA检测，认定女尸是董某娥。继而查明万某广是真凶，于2020年初抓获。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

三、如何理解“侦破”和“查证属实”

人们一般将“侦破刑事案件”理解为办案机关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查明了犯罪事实，查明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并成功抓获。“得以侦破其他案件”，包括“侦破其他案件”和“对侦破其他案件起到了实际作用，可以暂未全面侦破”，不排除未侦破。侦查机关通过犯罪分子的交代找到关键证据，如凶器、毒品原物等物证，仅未抓到犯罪嫌疑人，尽管未侦破全案，仍可能认为甲有立功情节。

可能有人认为，尽管刑法第六十八条的“查证属实”不修饰“提供重要线索”，若未“查证属实”，就不会“侦破其他案件”，故“查证属实”是“提供重要线索立功”的要件。其实，既然是犯罪线索，就不能苛求百分百准确，应当容许一定的偏差。若查证属实，当然容易认定立功；若未查证属实，仍有可能成立立功。一般而言，犯罪分子提供的线索越具体，越利于查证属实。为了成立立功，犯罪分子会尽量提供更多信息和细节，不会明知却故意少说。若侦查耗时很久，宣判前未查证属实，在刑罚执行期间才查证属实的，宜视为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立功。

【例7】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某年某月我在某地看到张三殴打一男子，不清楚是否打死了，张三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张四，也可能是张四打的”。无论查明真凶是张三，还是张四，均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若甲说是张三打死的，经查是张四打死的，仍可认定甲成立立功。

【例8】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9年前乙故意杀死丙”。经查，丙被乙故意伤害致死，仍属于查证属实，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

【例9】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我的朋友圈上有一个卖假奢侈品的人乙，我觉得他很可能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经查，乙售卖的是走私的真奢侈品，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尽管甲的交代存在一定偏差，仍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

【例10】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某地警方协查通告上的某某真凶是乙，几年前已经死了，埋在某地”。经查，乙是真凶且死亡，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通缉令上的某某真凶乙几年前已经死了，埋在某地”。经查，乙已经死亡，应当认定甲成立立功。

【例11】犯罪分子甲了解到警方找到乙藏的5kg海洛因，到案后把乙的5kg海洛因的藏匿地告诉警方，警方得以查获5kg海洛因，属于“提供重要线索使案件得以侦破”，应当认定甲成立重大立功。假设乙贩卖25kg海洛因，警方已经查获了20kg，不知道剩余5kg在哪里，因甲交代5kg海洛因的藏匿地才查获，不能认为甲的交代可有可无，不能否认甲成立重大立功。

《人民司法·应用》2025年第11期要目

大法官中国

构建中国特色多元解纷机制

高晓力

本期策划——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司法

规制

涉人工智能司法纠纷应对研究

王毓莹 刘旭冉

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法律风险与制

度供给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定性

祝建军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

完善与建构

谷国文 王新龙 邓彩红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院政法专项编制动态调整机制

研究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

与适用

吴兆祥 李相波 田心则 邹涛

司法实务

长租公寓经营链条断裂型案件租金、占有使用费支付问题研究

周峰

企业庭外重组机制构建的必要性和

基本思路

俞钦玮 王冰如

渎职犯罪案件审判实践中的证据审

查与适用

徐兵

以网络形式开设赌场犯罪的刑法规

制

周欣 罗斌 郑莹

司法论坛

民事诉讼法上“有专门知识的人”制

度再认识

刘哲

2024—2028年欧洲电子司法战略

曹志勤译

房屋渗水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

点

冯晓华 凌雅娟 程睿哲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司法困境

与路径完善

柳文杰

民间借贷无效合同清算规则的检视

与体系化构建

李庄博

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现实困

境与优化路径

孙硕 刘迪

刑事焦点

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敦促在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犯罪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也涉及“提供重要线索”。从主体要件来看，是犯罪人员，可以是未决犯，也可以是已决犯。从时间要件来看，提供线索限于犯罪分子到案后，可以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也可以在刑满执行阶段。相比检举揭发犯罪型立功、协助抓捕型立功等，对提供重要线索型立功的研究很少，一些疑难问题亟待解决。

一、如何理解“线索”

人们一般把“重要线索”理解为“犯罪线索”，不限于重要犯罪的线索。这里的“犯罪”，可以是立案后侦查未终结的犯罪，也可以是尚未立案的犯罪，还可以是已经审结的错案背后的犯罪；罪名应限于公诉罪名，不要求犯罪分子清晰地知道准确的罪名。线索应当与犯罪、犯罪人有关，通常是部分犯罪事实，少数情况下可以是完整的犯罪事实。（1）若是完整的犯罪事实且是证明对象，一般属于检举揭发犯罪型立功。（2）若是难以查实的犯罪且本身不是证明对象，需要诱惑侦查等手段重新取证的，即使其是完整的犯罪事实，亦视为“犯罪线索”。如犯罪分子甲到案后交代“乙在二个月前把2克海洛因以800元的价格卖给丙”，虽然是完整的犯罪